

## 社区发展与生育率转变

——世界生育率调查有关研究评述

宋瑞来

### 一、研究的必要性

近一阶段有关社区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量与家庭生育行为的关系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下列理由:

第一,以往有关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大量的实证研究,或强调宏观变量的决定性作用,或强调微观变量(家庭或夫妇个人特征)的决定性作用,长期忽视社区层次变量的独立作用。

第二,无论是直接沟通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的分析模型,或者是单纯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的模式,都包含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即所研究的微观行为主体面对的社区背景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各个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都具有显著的同质性。

有关社区特征与生育率转变关系的研究恰恰认为上述假设是不切实际的,从而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假设:只有生活在相同社区中的个人所面对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才是相同的。社区特征对夫妇的生育行为有独立的作用,它与夫妇的个人特征共同有效地制约夫妇的生育行为(罗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Freedman), 1974)。

第三,从实践上讲,这一观点之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有关生育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缺乏重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尽管70年代“新家庭经济学”所提出的微观生育行为分析模式曾盛行一时,但实证分析结果,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有关问题实证分析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另一方面,社区特征与生育率转变关系的研究强调以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为重要前提。生育率地区间的差异越大,结合社区差异作出合

理解释的潜力也就越大,而这种地区间的生育差异则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普遍特征。

第四,从分析框架上看,不少学者都先后意识到单纯宏观分析或单纯微观分析所具有的局限,开始把视角转向探索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相互联系的渠道。伊斯特林(Esterlin)试图用孩子供给、需求和生育管理成本这一概念框架作为二者联接的桥梁,而弗里德曼则从社区变量这一角度进行尝试。这一点是明确的,即人们普遍承认社区是宏观与微观相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如果能在社区层次找到一组生育率变化的决定因素,也就能从这一方面确定宏观变量影响微观变量的途径。

第五,长期以来,社会学一直探索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事实证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涉及生物、经济、社会、心理等多门学科,仅从单学科探讨有很大局限,而社区研究则从方法上克服了这种局限。社区毕竟是综合承载这些因素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社区特征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聚焦于所定义的区域,个人的生育行为如何及为什么受到特殊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的制约,从而在别无选择之中做出选择,其实质是探索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如何在社区这一层次相互制约,从而导致社区生育率这一结果。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妥善处理这两种理性的决定正是实施“诱导性人口转变”所面对的最尖锐的难题。

### 二、有关的假设和变量设计

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一主题所进行的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实证研究是“世界生育

率调查”。该项调查涉及了42个发展中国家，并从中挑选17个国家进行了社区特征与生育率关系的抽样调查。罗纳德·弗里德曼为17国的调查提供了基本假设和变量设计，下面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一) 基本假设。其基本假设认为：社区特征对夫妇的生育行为有独立作用，它与夫妇个人特征共同制约夫妇的生育行为。社区特征在这里指居住于社区的个人所共同面对的任何特征。这种特征由两类要素组成：第一类是整体性变量(global variables)，它包括社区内有无医院、学校、市场等。这类要素只能基于社区整体而不能基于个人进行区分。第二类是环境或结构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它包括平均受教育程度、全体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或孩次分布等。这类要素试图描述生活在该社区的个人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它通常是基于个人指标的合计。社区特征可能对个人生育行为有独立作用，它与个人特征共同对个人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个人的行为部分地依赖于他怎样按照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行为标准来审定他自己的行为，并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确认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

(二) 变量的选择与设计。用于描述社区特征的变量具体分为以下几类，它们分别用于检验不同方面的假设。

1. 社区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变量。其目的是检验这样的假设：社区生育率或社区内个人的避孕实践与社区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与社区被整合入更大的社会中心的程度有关。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内的避孕实践也就更普遍；新观念、新方法就更易于在社区内传播。这些变量主要包括：

社区与最近的中心城市的距离及用日常工具到达该中心所需花费的时间；社区与最近的日常交易市场的距离及抵达所需时间；社区与最近的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邮局、银行的距离及抵达所需时间；社区内的电话、

收音机的拥有量，报纸订阅量，电力消费量。

2. 社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及设施。其目的是检验各社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它包括：

社区内有无合格医生、助产士或其它医疗工作者，若无，找到这种服务所需时间及服务设施的距离；社区内有无医院、诊所，若无，得到这种服务所需时间及服务设施的距离；婴儿或儿童患病一周内，是否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资料。

3. 计划生育设施和避孕普及率。这用以检验社区计划生育服务数量、质量与避孕实践的关系。它包括下列变量：

社区内有无提供家庭计划服务的诊所、医院或其它类似设施；若无，得到类似服务所需时间及服务设施的距离；社区内有无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医生，这些医生不包括诊所或医院的医生，若无，得到类似服务所需时间及与社区间的距离；社区内有无家庭计划工作者或类似的工作人员；社区内计划生育的普及率，特别是各类社区领导者的计生普及率。

4. 教育。尽管教育这个因素通常是，但并不总是与生育控制呈正向关系。人们普遍认为教育不是降低生育率的直接原因。这里检验这样的假设：教育增加了个人接受新的生育控制观念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使个人摆脱了狭隘的地方性、家庭性偏见的束缚，使个人与更发达的社会体制、社会观念建立了联系。它涉及下列变量：

成人平均的受教育水平，社区内的文盲比例，成人受过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比例；社区内有无小学和中学，若无，孩子平均到达此类学校所需的时间及学校与社区的距离；社区内学龄儿童在小学和中学的注册率。

5. 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检验这样的假设：社区中农民所使用的农业生产手段越现代化，生产和销售与现代市场体系联系越紧密，其降低生育率的动机就会越强烈；就

社区内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农村社区对地方性农业资源依赖的程度越低,社区内个人与现代观念、现代体制相联系的机会也就越大,受地方、家庭传统观念、体制的束缚就越小。它涉及:

社区内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设备使用的程度;化肥、现代灌溉设施和新型良种推广的程度;农产品用于自我消费和市场销售的比例;人均农业产值,每个农业劳动力的产值,人均耕地和农户拥有土地的平均规模;社区内有无雇佣10人以上的非农企业,如果没有,该社区与这类企业的最近距离;社区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其中多少是属于长期的,多少是属于季节性的。

6. 社区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联系。假设社区与更高一层的政府职能部门接触越少,其保持传统格局的可能性就越大。政府的职能部门代表着“现代化的影响”,它向居民传输和反馈着各种“新发展”的信息。它涉及下列职能部门:警察、地方法院;税务、土地管理和人口统计部门。

需调查的是这些部门在社区内有无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是否经常到这里来;如果没有这些部门,代理人与该社区的最近距离是多少。

上述变量设计是弗里德曼依据各国有关调查而整理出来的,其后演变为世界生育率调查中有社区问卷部分的主体设计。

### 三、目前的研究成果和主要问题

世界生育率调查有关社区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成果,汇集于1985年出版的由卡斯特林(Casterline John B.)主编的《社区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一书。这是该课题组关于社区与生育率关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也是有关社区与生育率研究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这本论文集不仅交流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对社区资料收集与分析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总结,为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从课题的主要假设与验证的角度上看,所获得的成果是令人失望的。

1. 各国依据各自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在一些主要假设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国家发现农村社区的电力供给与消费的程度、计划生育设施和计生工作人员访问社区的次数、人均的教育水平和较便利的获得教育的机会等对生育控制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另一些国家只发现不显著的作用。在跨国的横向比较研究中缺乏普遍的一致性的结论。

2. 依据目前的调查资料,从整体上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社区特征的独立作用弱于个人特征对生育率变化的独立作用。就这次大规模的跨国研究的基本假设而言,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失败的。

(二)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生育率决定因素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角度来看,这次研究有以下积极成果:

1. 尽管该课题的基本假设并未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但其基本思路仍得到多数人口学家的肯定。我们可以说,这项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引起国际人口学界对社区与生育率关系的日益重视。它扭转了生育率决定因素研究中只注重宏观特征或微观特征的局面,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社区特征,转向“中观”因素的作用。在此之后,在生育率调查中增设社区问卷已成为变量设计的主流。

2. 该项研究从主要假设、问卷设计、实证分析方法等各个方面为今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面对课题实证研究令人失望的结果,专家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其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为以下几项:

1. 资料搜集的方法问题,尤其是有关时期而不是时点资料搜集的问题。有关社区特征的变量设计,例如交通、通讯、健康及计生设施的有无等,变量设计未考虑时间维。

抽样调查只获得某一时点的资料,而未掌握时间系列的资料。一个提供计生服务的医生或诊所在社区内或社区邻近地区,存在1年或存在5年,其效应肯定不同。大部分用于代表社区特征的变量设计都存在这一致命的问题。专家们建议用两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是在今后问卷设计中增加时间维,起码考虑近5年的变化;另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放弃抽样调查的方法,最适用于社区研究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社区内进行较长期的跟踪调查,观察社区发展的动态和人们行为对之作出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2. 课题的主要假设问题。即使课题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绝大多数专家并未对“社区特征对生育率有独立作用”这一基本假设提出疑问。然而社区特征变量的选择是依据一系列的有关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合理,则有一些专家提出了异议。卡斯特林认为问卷设计缺乏有关社区规模方面的变量,从而缺乏对社区特殊性质和行为机制的理解。同时,各项主要假设之间的关系松散,没有形成一个严谨的理论模型。这个缺陷导致社区特征的指标设计数量众多,且许多指标之间有高度相关性。笔者也赞成这种意见,认为这是该项研究总体归于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问卷有关社区特征的变量设计,给人以“漫天撒网”的感觉,涉及了许多方方面面,每个假设单独来看都很合理,但凑在一起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区分谁主谁从。简而言之,它没有注重捕捉什么是社区的核心特征,而把注意力分散到网罗社区众多的表层特征——社区有无各种现代化设施或社区与这些现代化设施的距离等。这些表层特征很难代表社区间的文化差异。试想中国与巴基斯坦两个经济发展程度相同的村落,各自都有一个小学和一家为计生服务的诊所,谁能想象这些现代设施对两个文化背景(例如宗教)有巨大差异的社区成员的生育行为会有同样

的影响呢?社区的核心特征涉及社区的文化、行为规范、价值观体系等这些“软件”方面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与社区的组织结构、社会体制有密切联系,也与农村社区内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有着紧密的伴生关系。忽略了这些核心特征,而过多地注重了表层特征,不能不使该项研究坠入雾中,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

弗里德曼在讨论会的总结中也意识到理论模式上的欠缺。他认为一方面在横向跨国的研究中采取一种共同的模式显然不成熟;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在深入、细致的案例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模式,在这个框架下确定进一步调查的内容,这些内容应加入主要的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量。这些需要具备更敏锐的洞察力和想象力。

3. 社区的定义问题。世界生育率有关社区的调查所确定的社区单位为村。它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的问题。由于各国“村”的人口规模差别很大,调查确定取样的村其人口上限不超过1万人。以村为基本社区单位的理由在于:村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单位,也是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这样便于进行抽样。然而该项调查并没有对社区作出一个内涵统一的定义,这就给资料的搜集和分析造成了某种混乱。许多与会的专家认为这也是导致研究成果大大低于期望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

(1) 社区的界定不清给资料搜集带来困难。在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基层行政单位并不在村一级,村与村的地界、人口数量含混不清。孟加拉的调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一些地区不知“社区”到底有多少人口。这对资料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

(2) 社区的界定不清影响分析的深入。一方面难以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研究,一方面难以根据社区的社会特征进行分类研究。社区的界定不仅包括其地理范围,也包括其“社会环境”的范围。各国对社区的这两类

“范围”缺乏统一的理解,也就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基点上进行分类研究。

弗里德曼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社区内有无集体的行为规范、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社区内共有的要素是否与法律或行政意义上的单位相一致,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与行政意义上的“社会”是否相一致。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从抽样的组织上来讲,离开行政划分的单位恐怕很难实施。

对社区作出明确的界定是必要的,但并不容易。从研究社区人口效应的角度,麦肯尼克(Mcnicoll Geoffrey)曾建议所选择的社区单位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或是拥有正式的、合法的控制社区成员的行政结构,或是拥有非正式的能控制社区成员的手段;第二,社区成员至少能部分地参照其他成员的利益来确定自己的利益(Mcnicoll, 1975)。实际上对社区的定义已不下百种,人们常依据研究对象、目的、手段对社区作出不同的规定。一般对社区的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社区指所定义的地理界域内的社会关系;

(2) 这种关系对个人来讲具有“归属意义”,对全体成员来讲具有相互团结的意义;

(3) 社区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

(4) 这是一种非工作场所的关系且主要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John Cater and Trevor Jones, 1990)。

4. 研究方法问题。世界生育率调查有关社区的研究论文,多数采用以下三种分析方法:构造指数法、因素分析法和多元相关分析。构造指数法是把社区特征浓缩成几个“发展指数”或“现代化指数”,然后再分析这些指数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联系。其优点是简化了指标,但主要的弱点是丧失了许多信息,特别是难以用于分析有关社区文化、社区制度方面的信息。因素分析法和多元相关

分析有自己的优势,但其分析结果更紧密地依赖于资料的高质量,而这次调查的质量不如人意,无疑使分析方法的效果受到影响。

#### 四、借鉴意义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世界生育率调查关于社区的研究对中国的人口控制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难点在农村社区,且不同地区生育率的差别十分显著,导致这种差别的主要因素需要从社区角度进行研究;此外,人们普遍承认社会干预对中国的个人生育决策存在重要影响,有关人员也尽力在“村”一级构造有利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物质环境,而利用社区分析模式不失为满足这种迫切需求的较好选择,它毕竟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为农村基层的生育行为分析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

(二) 尽管存在上述客观需求,但国内对社区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仍十分薄弱。中国1985和1987年的第一、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都设计了社区问卷,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程度等23个问题。取样的单位是村。目的是对生育行为进行相关分析,并探索影响生育的直接因素(中间变量)与间接要素(社会、经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国1988年的2%生育节育调查也进行了类似的社区调查。令人遗憾的是这几项调查目前只出版了个人和家庭问卷的汇总资料和研究报告。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问卷设计与世界生育率调查有着同样的缺陷,即难以抓住社区的核心特征而过多地注重社区的表层特征,缺少关于社区规范、态度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变量,缺乏资料的时间维度。

鲍斯顿和贾忠科曾依据1982年普查的2306个县级资料,通过构造4个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分析、探索这4个指标对县际生育率差别的作用(鲍斯顿、贾忠科,1990)。

值得重视的是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近来

对农村社区与人口控制的研究,采取典型调查的方式,并注重对村、乡社会环境差异性的分析,其初步研究成果是富有启发性的(彭希哲、戴星翼,1992)。

总的来讲,国内尚未对社区与生育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新的动向令人鼓舞。

(三)笔者认为应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教训,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村基层社区与生育关系的研究。

1.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社区发展与生育转变关系的综合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之下,结合中国的地区差异,例如东部、中部、西部,建立相应的分类模型。

2. 筛选与生育行为联系密切的社区核心特征,这些特征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制度、社区组织的安排与变化。自1979年以来,中国农村社区制度与社区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的行政职能和生产职能分别被村委会和家庭生产责任制所取代,同时乡镇企业也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些变化使社区的权力结构及行为控制系统都发生根本性变革。近年来乡镇企业这种社区组织的发展对社区生育行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乡镇企业有4种形式:乡办、村办、联户、个体。它们各自对社区的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并不明确。

(2)社区所能支配资源的数量及分配资源原则的变化。这里假设社区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量越大,社区资源分配的原则与计划生育目标整合的程度越高,社区对生育行为发挥独立作用的程度越高。

(3)社区封闭与开放的程度。它包括社

区成员经济、社会活动的地理范围;产品生产流通的地理范围;信息流特征,例如邮电、通讯、运输设施的普及程度及婚嫁半径等。

(4)用态度变量衡量社区舆论导向及婚姻与生育规范。

3. 一旦确定社区的核心特征,要考察宏观变量、微观变量与社区核心特征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模式。在社区核心特征与微观变量的联系中,应区分家庭与个人这两类要素。不揭示社区特征与家庭特征之间的联系,对社区变量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容易产生误解。在中国农村,社区发展及社区特征的形成与家庭的演变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传统家庭、家族网络的瓦解程度无疑是社区结构正经历转变的重要标志。

总之,从社区角度研究中国生育转变有可能成为我们破解中国人口转变机制之谜的一个合理途径。

#### 参考文献:

1. Ronald Freedman: WFS. Occasional papers. May, 1974. No. 8.
2. Casterline John B. et. :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Community Data."
3. McNicoll Geoffrey: "Community-level population policy: An Explor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5"
4. John Cater and Trevor Jones: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
5. 鲍斯顿和贾忠科: "中国县级社会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人口与经济》,1990第2期
6. 彭希哲,戴星翼: "农村社区与农村人口控制",《人口研究》,1992第2期

(本文责任编辑:高春燕)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